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内涵及贵州实践启示

颜红霞^{1,2} 韩星焕¹

(1. 吉林农业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8;

2. 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保护生态与消除贫困是21世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中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脆弱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保护生态、消除贫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现,因此我国开展的生态扶贫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的理论蕴含了五个要素属性,且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并产生内源性减贫发展动力。贵州生态扶贫的实践模式为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提出了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生态扶贫; 中国特色; 实践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7)04-142-148

自199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200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就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英国学者戴维·皮尔斯认为:“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世界生态恢复能力最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1]中国是贫困人口多、生态环境较脆弱的国家之一,贫困和生态环境问题交叉重叠,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尽管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之路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但到2020年要完成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却是异常复杂又艰巨,尤其是西部地区。因此,对中国最早开始生态扶贫实践的贵州进行理论检视,显得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的理论内涵

(一)生态扶贫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1. 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生态扶贫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02年《人民日报》上,文中指出:“生态扶贫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着手,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扶贫方式”。^[2]实际上,贫困就是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一种失败关系,贫困降低了人们以可持续方式利用资源的能力,从而造成对生态系统的压力。

¹**作者简介**:颜红霞,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民族大学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韩星焕,博士,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发展。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山区、高寒区、高原区以及地方病高发区等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地区，我国的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耦合，^[3]导致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与生态建设工作在区域与目标上都存在着高度的重叠，^[4]生态扶贫理论就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和实践逐渐形成的。

2. 生态扶贫的理论基础。生态扶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丰富的实践历程，是在多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1)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与自然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协调，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我们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5]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刻地论述了资本对自然的破坏，科学指出了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社会制度基础，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生态扶贫注重生态保护基础上的脱贫和发展，强调贫困人口的全方位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国化的发展实践。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生态扶贫既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组成与本质要求。(2)基于多元贫困的亲贫困增长理论(又称益贫式增长理论)。随着对贫困原因及其特征认识的深化，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贫困是多维的，致贫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发展经济不是唯一的减贫方式。因此 Ravallion Martin 正式提出亲贫困增长理论，具体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生态扶贫理论就是基于亲贫困增长理论瞄准穷人，意识到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解决贫困问题不仅仅看经济增长的结果，还要看增长的性质，看贫困群体能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多少好处和什么样的好处，认为只有通过提高对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瞄准精度，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生态增强、农民增收的共享式发展。^[6](3)绿色增长理论。“绿色增长”的概念最早是由 Murgai 于 2001 年提出，2005 年经合组织(OECD)将“绿色增长”定义为“在防止代价昂贵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的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目的是为了纠正传统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忽视为实现经济增长而造成的环境破坏，遏制损害环境的生计行为。绿色增长理论下的“绿色扶贫”意为有利于减贫的绿色增长，^[7]强调促进贫困地区的绿色发展，要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求与生态结合的整体发展，从单纯追求物质发展转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全面脱贫。这与生态扶贫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一致的，为生态扶贫的实践转向与理论发展提供了借鉴。(4)可持续发展理论。1987 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将环境问题与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纲领成为与会者共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消除贫困不仅要注重人所依存的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还包含人自身(生理、心理、文化等)的发展，充分考虑到贫困、环境破坏、欠发达状态下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并对后工业阶段的“增长”(growth)与“发展”(development)概念进行了反思。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不但为人类的近期发展与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8]也为生态扶贫的理论形成提供了契机和支撑。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扶贫脱贫工作之所以被称之为当下中国的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一场决战，就是因为贫困地区自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不可能像发达地区那样还有时间和机会可以先积累再修复、先增长再治理，必须一揽子解决后工业化时期集中面临的多维矛盾与冲突。这就要求贫困地区立足自身的区域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摆脱长期对资本、技术、政策性倾斜投入的依附性和“漫灌式”扶贫的依赖性，在优化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政策等手段来增强人力资本，创新资源配置，完善体制机制，寻求“先益贫后益增”和“边增长边分配”的突围战略，使所有人都能公平分享到发展好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

中国特色生态扶贫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不断探索以契合中国的现实并经过长期的脱贫实践之后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在内涵属性上，主要包括：“资源靶向供给”、“差异有效缩减”、“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增权制度完善”五个基本要素(见下页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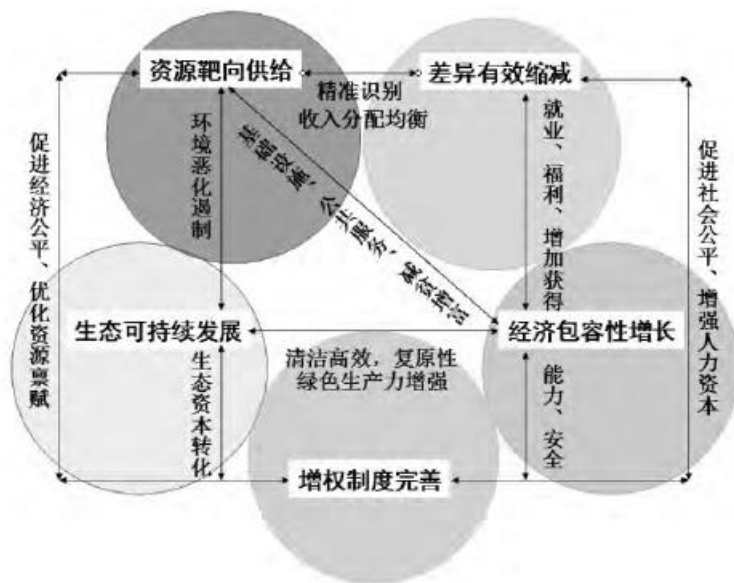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内涵要素图

这五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在发挥内涵性功能时循环互动，产生内源性减贫发展动力。贫困地区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根据自身的发展位和生态位^[9]权衡协调五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态扶贫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资源靶向供给”达到“经济包容性增长”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实现“差异有效缩减”及“增权制度完善”，最终促进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人“五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而扶贫攻坚的过程不仅需要“资源靶向供给”的短期性政策工具，更需要“增权制度完善”即资源与制度的稳定结合，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性正义”、“分配性正义”、“环境正义”和“发展正义”的实现，这五个要素的相互作用、良性循环共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扶贫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形成，不是生态与扶贫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起点，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筹，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核心，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与生态思想中国化的总结继承与整合创新，不仅是基于中国多年来谋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更是两个百年目标中国梦的伟大复兴进程中的自我救赎，凝聚了具体而丰富的时代内涵，是当下最显性的中国话语，对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世界各国，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贵州实践

贵州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西南内陆省份，平均海拔 1100 米，岩溶地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3%，属于典型的喀斯特高原山地省。由于山多坡陡，降雨频繁，导致水土流失、石漠化极为严重，加上人均耕地面积少，少数民族人口多，在国家划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贵州就占了 3 个，全省 88 个县级单位中有 71 个被划入，占 80.6%。同时贵州又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地带，是长江、珠江流域的重要生态屏障，生态功能极其重要。1988 年，地处乌蒙山连片特困区的毕节，总人口 570 万，其中农村人口 545 万，生产总值为 23.4 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 316 元，贫困人口高达 312.2 万，成为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①当年，国务院就在贵州建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最早开启了我国生态扶贫之路。从那时起，贵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开展了近 30 年的艰苦探索和实践。

(一) 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通过资源靶向供给实现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大范围存在的石漠化山区，贵州省政府制定政策加大投入，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森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同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治理江、河、湖泊周边环境，对山、水、林、田等进行综合治理。“十二五”期间，仅仅在长江流域就投入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资金 6.15 亿元，共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 6592.6 平方公里。^②其中，毕节为全国贡献了“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的“五子登科”综合治理模式；黔西南州的晴隆县，在陡坡岩溶山地通过种草减少水土流失，有效防治石漠化，并将散养和圈养相结合，科学养殖肉羊，探索出石漠化地区草场开发与畜牧业扶贫相结合的草地生态畜牧业扶贫的“晴隆模式”，促进了石漠化治理、扶贫开发和农民增收增能的有机结合；赤水市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凤凰沟，探索在水系周边植树造林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流域内重点发展杏、桃、李等水果种植以及瓜果采摘农家乐，以发展经济解决贫困，并总结出水系治理(Water system regulation)+生态修复(Ecological restoration)+人居改善(Habitat improvement)的“W·E·H”模式。^③

贵州在对山、水、林地的综合治理中，将树林、草地等生态要素与相关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生态资源与资本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系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2016 年，毕节市的森林覆盖率由 1988 年的 14.94% 提高到 50.2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16 元提高到 7702 元，贫困人口总数由 312.2 万人减少到 92.43 万人；现在的凤凰沟年均土壤侵蚀量减少了 3.2 万吨，有效拦蓄地表径流 40 万立方米，水土流失现象基本消失，年直接经济效益高达 3000 余万元，^①成为贵州省集生态观光、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内容为一身的旅游示范区；而成效突出的“晴隆模式”更是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较大影响。

(二) 依托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扶贫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贵州依托生态资源，确立了草地生态畜牧业、精品水果、蔬菜、核桃、马铃薯、油茶、中药材、茶叶、特种养殖和乡村旅游业等作为十大扶贫产业，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以生态链发展产业链、以产业链打造扶贫链的“生态+”特色产业扶贫路径，使全省农民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在 2016 年就有 73.4 万贫困人口实现了产业脱贫。^②

1. 生态循环产业，推行种养立体循环发展模式。贵州历来就有“稻鱼共生、摘禾挂凉”的原生态种稻文化传统，注重农业的循环发展和产业综合开发。“养殖—沼气—果蔬”一体的生态农业循环模式及“田里种稻、岸边桑蚕、水里养鱼”的立体种养模式是贵州省重点推广的扶贫项目，草地生态畜牧业也作为十大扶贫产业重点发展。毕节的织金、大方和黔西三县林下养鸡产业发展迅速，形成养鸡提高收入、鸡粪促进林草生长的生态饲养模式；铜仁的沿河县孙家村，依托其地理优势大力推广立体农业，在地上种植当地的传统水果空心李，在树干上种植铁皮石斛驯化苗，在李子树下套种中药材白芨，形成了“树上长金条、地下生元宝、空中挂仙果”的生态立体农业模式，这种模式使得昔日的贫困村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2. 特色生态产业，实施差异化“生态+”产业带动扶贫战略。贵州在强调生态与产业一体化布局的基础上，利用生态多样性优势，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的不同，在全省形成了“东油西薯、南药北茶、中部蔬菜、面上干果牛羊”的产业扶贫格局。各地依托其自身的优势，差异化实施“一乡一品，一村一特”等多种“生态+”特色产业，如形成了修文谷堡乡的猕猴桃、三都交梨乡的葡萄、沿河沙子镇的空心李、荔波朝阳镇的蜜柚等一批特色产品。同时，重点扶持龙头企业，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形成网络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互助脱贫带动发展模式。此外，在一定区域内鼓励产业集聚，发展“多乡一业，多村一品”，发掘特色产业长廊建设的集群效应，以大型产业长廊生发产业集群效应，使茶叶种植以及火龙果、蓝莓等产业集聚成为地方的支柱产业，再将各自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贵州省的经济增长，实现减贫发展。例如：独特的地理气候生态，使“黔地无闲草，遍地皆良药”的贵州把发展道地中药材列为“十大扶贫产业”的重中之重，截至 2015 年底，全省中药材产业共带动农民 338.39 万人，其中贫困人口 111.23 万人，药农人均增收 4600 元。^③以大健康为目标的医药养生产业，已成为贵州增收致富、治理生态和绿化环境的新兴生态扶贫产业。

3. 生态旅游产业，以民族旅游、山地旅游为特色的大旅游战略推动大扶贫。少数民族聚集地多是贫穷落后区，而其传统的习俗，浓郁的民族风情，独特的民族建筑，却是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贵州省依托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生态资源，发展出

各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山地生态旅游。如铜仁市将境内独特的梵净山生态与佛教文化、民族民间文化融入旅游，带动扶贫，通过重点打造“梵天净土”文化生态品牌，形成了江口云舍“中国土家第一村”、德江“中国傩戏之乡”、石阡温泉群、乌江山峡百里画廊等文化生态旅游经济廊，带动餐饮、文化、手工艺等相关产业发展，不仅保护了脆弱的生态环境，还激活了农村经济。仅1个云舍民俗文化村就辐射带动周边4个行政村，超过1万群众增收致富，四年的时间使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元增加到3.5万元左右，成为全国首批“文化旅游示范地”。④通过实施大旅游带动大扶贫战略，2016年贵州实现旅游总收入达5027.54亿元的“井喷式”增长，获得15个全国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乡村旅游带动29.4万贫困人口就业增收脱贫。

(三) 通过“互联网+”开展扶贫管理和电商扶贫，借助大数据全面推进大扶贫

贵州通过“互联网+”打造的“扶贫云”平台，破解了传统扶贫方式面临的重重困难，实现了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贫困原因的精准分析、扶贫供给需求的精准对接和扶贫动态信息的可视化监测。“互联网+扶贫”可对政府扶贫与环境治理工作的决策考核，进行精准化的数据管理，对扶贫资金的使用实行全程监督，有效防止被脱贫、数字脱贫，提高扶贫效率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大数据技术应用在生态扶贫实践中，不仅极大提升了“资源靶向供给”和“差异有效缩减”的要素功能作用，最大程度发挥“增权制度完善”的属性价值，而且大数据产业本身也是新兴的绿色生态产业，更能彰显其自身“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包容性增长”要素的内涵价值。电商扶贫是大数据产业扶贫最直观的体现，不仅拓展了生态产品的市场通道，还提高了生态资源的融合价值，延伸了生态扶贫产业链。六盘水市的中国网络菜市场总部运营中心，就是“中国农业云大数据”与“中国网络菜市场”采取“1+1=1”的模式运营，以电商为载体、数据为基础，共同构建的全新农业电商扶贫产业链。目前，贵州农村电商网点超过1000家，预计2018年投资1890万元，还将新建1000个贫困村电商扶贫试点。②“互联网+扶贫”是生态扶贫在信息时代的新运用，是科学发展观在现代社会减贫发展中的新突破。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贵州，正在积极完善电商扶贫应用系统，在大数据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中加速生态扶贫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加大推进以互联网+扶贫为导向的大数据扶贫金融、大数据社会扶贫服务、智慧物流等一批大数据公共服务新型业态建设。

(四) 扶贫生态移民，生态扶贫的反向开发与环境移民的融合创新

上面所有的生态扶贫路径，都是在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加法，无论是保护生态、改良生态还是利用生态，都是先将生态资源优化为资本再进行“生态+”的扶贫开发。但是在贵州这块生态特殊的区域内，最贫困人口大都居住在自然条件特别恶劣地区，无论怎样扶都“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还有一些是居住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但生态功能又极其重要的保护区。对于这些无法或不能实施“生态+”产业扶贫地区的贫困人口，为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贵州创新扶贫思路，通过做减法，进行生态扶贫的反向开发，从2012年6月起开始“扶贫生态移民”，先减去环境的人口承载量，进行旧房拆除、复绿复垦的生态恢复工作，再对贫困人口以就业和增收为核心进行扶贫安置。实践证明，这是目前生态扶贫各要素互动功能发挥最好、也是最有效的拔掉“穷根”的途径之一。

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满足搬迁对象多元化需求，贵州省计划用9年时间将200多万贫困人口搬出大山，依托县城、集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和农民新村等生存与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进行以产搬迁、以岗搬迁，坚持城镇化集中安置，向交通干线靠拢，积极推进跨县、跨市州安置。这样既有效缩减了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让城市优质资源惠及农村贫困群众，又能让各种扶贫资源靶向供给，让搬迁农户向城镇聚集，在助推城镇化发展中脱贫致富，最终使原居住地的生态也得到改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贵州实践启示

2016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和同步小康决战区的贵州省，又被选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再次证明贵州近30年的生态扶贫之路是成功的。综合贵州开展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实践经验，总结归纳出贵州省实施生态扶贫的路径框架如下(见

下页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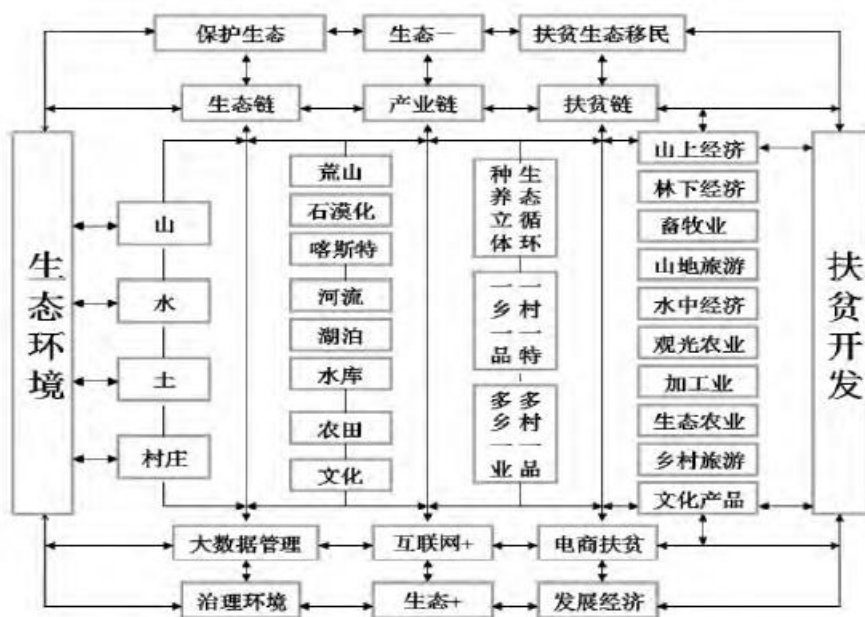


图 2 贵州省生态扶贫路径框架图

贵州省生态扶贫的总体框架是以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为双向指的循环互动。基于生态环境的框架可分为:以减法为主的保护生态、以加法为主的治理环境和以互联网新技术为手段的综合管理,总体指向是打造生态资源链,形成生态资本。基于扶贫开发的框架可分为:以减轻生态承载为主的扶贫生态移民、以改良、利用生态为主的“生态+”产业开发扶贫、以生态产品运营为主的“互联网+”产业融合扶贫,总体指向是打造生态产业链,形成生态扶贫链。

贵州省生态扶贫的总体路径是根据不同的生态资源打造不同的生态链,利用不同的生态链发展不同的产业链,再以“生态+”和“互联网+”融合形成不同的扶贫链,实现生态链—产业链—扶贫链的循环发展。在具体路径上,按照“因地制宜”的总原则对不同的链条版块进行纵向延伸和横向延展,综合选择适宜的生态扶贫方式。例如:在生态链版块,主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山、水、土以及村庄的不同特点,利用资金、政策等资源的靶向供给和“扶贫云”等技术的综合监测管理,有所侧重地纵向开展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然后再延展到产业链版块进行不同的产业开发或移民搬迁,最终形成不同成效的扶贫链,发展经济促进脱贫增收。生态环境与生态扶贫之间呈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良性互动关系。

贵州省生态扶贫的实践模式,为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也提出了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生态扶贫除了立足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更要强调社会生态治理和增权制度的完善

现阶段基于同步全面小康的时间压力,扶贫过程中偏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开发,社会生态的良性治理有所偏弱。近年来,扶贫资金挪用套用、编制虚假项目多头重复申报等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产业扶贫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不足,财政扶贫资金及相关政策资源偏好扶持“龙头企业”和“大户”,“行政+大户”的模式成为执行国家产业扶贫策略的主导机制,对贫困农户发展小农经济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受双重制约的基层实际困境认识不足,存在使扶贫对象成为几乎没有任何

分配资源权力的被组织者和被管理者，进而成为社会生态治理利益受损者的潜在趋势。

因此，在扶贫过程中应当加大社会生态的良性治理，才能有效保障扶贫资源靶向供给，确保惠及贫困，同时也能成为完善扶贫增权制度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增强贫困群体民主参与的能力和权力，缩小与“农村精英”的差距感，增强他们在合理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社区的治理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真正落实习近平同志增强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体“获得感”的要求。贵州的生态扶贫，本文之所以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理论下的实践模式，正是基于其社会主义内涵，是既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放任模式，又有别于传统的过度依赖指令性计划和高度行政化的救助式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与创新。因此，特别要警惕在追求扶贫目标短期效应的过程中，对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过分偏重，可能在农村社会形成新的政、商加“地方精英”中间人合谋的利益集团，不顾贫困农户的权益及其主体性所导致的社会弊端与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二)完善生态扶贫政策实施措施，使之成为国家常态化发展战略

基于“十三五”目标的战略实施，生态扶贫选择了因地制宜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短期见效的策略，重点也着眼于规模化、一体化的产业扶贫战略。在实际操作中，突出以项目制作为政府进行资源再分配的手段，特别偏重对具规模经济效益生产实体的扶持和补贴。从一定阶段的减贫效果来看，发展规模化、产业化的生态农业经济，确实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就就业渠道，贫困农民收入得到了显著增加。但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和自身组织结构上固有的内在问题，这种模式增加了中间环节对贫困农户的利益盘剥，加上贫困农户自身开展“纵向一体化”高附加值农产品经营的产业化机制缺失，最终无法解决小农自主合作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更广泛的农村经济活力难以真正释放。扶贫生态移民的城镇化集中安置，虽然让农村贫困户享受到城市优质资源，但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进程下，从贫瘠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贫困人口将变成廉价劳力涌入城镇，而由于扶贫增权制度的不完善又不能真正“市民化”。所以，生态扶贫的区域性和短期性政策实施，从长远来看可能脱贫未必致富，也未必如政府所预期的那样“带动贫困农户发展”，相反却可能同时出现“劳动不充分”和“劳动力不足”的矛盾现象，进一步强化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支配。^[9]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境外资本连同境内各种民间资本借扶贫开发、招商引资名义，凭借其资金以及技术优势进入贫困地区，通过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实现资本的扩张和价值的增值，造成国外资本对农民利益的侵占。一部分扶贫资金被滥用，一些企业甚至利用国家扶贫优惠政策通过虚假手段来套取国家的扶贫资金，导致国家的扶贫资金被截流不能靶向贫困农户，国家扶贫资金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极可能达不到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目的，甚至有可能造成不但不能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反而加剧社会不公。国家生态扶贫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资本进入扶贫领域，短期内可能会对扶贫工作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一旦这种政策影响作用消退，则贫困农户，甚至广大农民自身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将越来越狭小，贫富差距又将开始扩大，在某种意义上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只会以扶贫和发展的名义使得农民更加成为资本的附庸。

为此，从国家长远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考量，应尽快将各地生态扶贫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稳定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结构，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化政策机制，在后大扶贫时代统筹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彻底解决返贫和隐性贫困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问题。

(三)加大教育和文化生态扶贫的刚性投入，坚持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先供给

扶贫先“扶智”，赋予贫困人口均等的文化权和教育权才是贫困地区内源性发展动力。包括贵州省在内的全国连片特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难以通过经济增长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缩小，而区域内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全民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2016年贵州省《关于改革创新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将扶贫资金按照“33112”的比例投放，前面的“331”

即总共 70% 的扶贫资金是投向产业及与生产经营性、金融贷款有关的项目，只有 10% 用于扶贫培训，剩下用于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 20%，也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而扶贫培训的 10% 也大都用于技能培训，是出于“以劳务输出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增收”的功利性目的。当然，这种与脱贫机制有机结合的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贫困户自身能力建设，可以消除“短边效应”的后遗症。然而，本地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建设及均等化发展的投入除了有限的专项资金外，基本依靠薄弱的地方财政来统筹。而各类专项资金投入也片面强调功利性的产业导向，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投入相对弱化。生态扶贫虽然在理论上已将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充分纳入，但地方政府的实施却缺乏对教育和文化的刚性投入，对扶贫公共社会生态不具备显性的资源优先供给，对贫困群体精神层面的需求投入更是附着于功利性的现实选择。

因此，打通教育和文化生态扶贫的“最后一公里”，让贫困人口的精神和素质富裕起来，才是打通实现贫困人口全面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才能彻底杜绝贫困的代际传递，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让人民群众要有“幸福感”落到实处，这才算真正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扶贫的“最后一公里”。

参考文献:

- [1] (英)戴维·皮尔斯. 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325
- [2] 罗侠, 杨波, 庞革平. 生态扶贫(新词·新概念) [N]. 人民日报:华南新闻, 2002-10-28(1).
- [3] 查燕, 王慧荣, 等. 宁夏生态扶贫现状与发展战略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2, 33(1):79-83
- [4] 章力建, 吕开宇, 朱立志. 实施生态扶贫战略提高生态建设和扶贫工作的整体效果 [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8, 10(1):1-5
- [5] (德)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22.
- [6] 祁新华, 等. 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研究述评 [J]. 地理科学, 2013(12):1498-1505.
- [7] 徐秀军. 解读绿色扶贫 [J]. 生态经济, 2005(2):78-79.
- [8] 吴大华. 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4.
- [9] 杨未. 生态位视角下的精准扶贫解析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8):156-161.